

# 韓國詩話中

論  
中國詩  
資料選粹



鄭健行 陳永明 吳淑鈿 選編

韓國詩話申論中國詩資料選粹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鄭健行,陳永明,  
吳淑鈿選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ISBN 7-101-02889-6

I.韓… II.①鄭…②陳…③吳… III.古典詩  
歌—文學研究—中國—參考資料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23706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

鄭健行 陳永明 吳淑鈿選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 1/2 印張·244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21.00 元

---

ISBN 7-101-02889-6/I·380

## 前言

韓國在歷史上曾經大量接受中國文化，採用漢文作為公私撰述記載的書面文字。古時候韓國人接受基礎教育過程跟中國無異：從誦讀中國經典入手，擴展到學習中國和本國的子史文籍。所以歷史上的韓國人對世道社會，以至個人的修德履行、藝文創作，看法深受中國影響，與中國人分別不大。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歷代詩風均盛，隨之而出現的評詩論詩的文字，包括零句散篇以至專集，為數至多。這種情況韓國也不例外。歷代韓人評詩論詩，除了著眼於本國作家和作品，還有大量文字談論中國詩人和詩作，以及諸般和中國詩歌有關的事項。談論中國詩歌文字的總和，約略看來，不見得比談韓國詩的少得許多。這或者由於中國詩歌是他們詩歌的淵源所在，因此格外重視；又或者由於韓國古人心目中根本没有自外於中國文學圈子的念頭，中國詩歌可談的題材衆多，因此探究不已。不管

怎樣，大量韓人論中國詩歌的資料既然傳世，那麼即使從未涉目的人，也能據常理推測：其中一定有可寶重的內容，而不可能全無學術價值的。然則站在中國詩歌研究者的立場，這批資料便有接觸和參考的需要了。

近世以來，中國學者研究本國詩歌（或其他學術、文學範疇），開始注意和搜集域外的意見和資料作參考，譬如利用由日本傳回來的《文鏡秘府論》，就是例子。不過說到底，人們主要面向日本；至於漢文化圈內另一個國家——韓國——的資料，儘管有時也提及——譬如李植《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可是總的說來，重視似乎不足，也沒有人動念做搜集整理的工作。

我和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兩位同人陳永明教授和吳淑鈿教授一向對中國古典詩歌有濃厚的探討興趣。有見及此，我們產生這樣的意念：嘗試把歷代韓國人談論中國詩歌的資料集中起來，初步整理後介紹給學術界；我們於是撰寫計劃，一九九六年獲得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資助，開展工作。計劃擬定之初，我們對韓人資料掌握和認識還不充分，只是知道有價值的東西很多；經過兩年多的整理和探討，我們確切肯定先前的估計。

研究進行的第一步是資料搜集。這裏先說資料來源。我們是利用韓國大田市國立忠南大學趙鍾業先生編纂的《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以下簡稱《叢編》）去選輯資料的。《叢編》共十七卷（即十七冊），一九九六年五月韓國太學社印刷發行。從目錄看，全書收著作一二九種。詳細翻閱結果，一二九種當中，十四種有目無書，（一）另當中兩種用新韓文寫成，我們看不懂，暫時擱下不用。此外還有四種

是中國人作品——見於第三卷的《詩文清話》和見於第十七卷的《性理大全論詩》、《唐宋分門名賢詩話》、《詩法要標》，不入韓人論中國詩範圍，不在選輯之列。所以可供採用的實有一百零九種。而一百零九種當中，也不是每種都討論到中國詩歌；即使討論到，也不見得資料必定可用。到了最後，我們實際選用了五十六種著作中的資料，輯錄打印，編成七冊，約五十來萬字。我們看來，韓國詩話中學術價值較高的一部分資料，可以說包括進去了。

所以說「一部分資料」而不是全部資料，理由如下：趙鍾業教授的《叢編》是他窮畢生之力搜集得來的詩話彙集，資料的集中和豐富，無疑令人驚歎；可是還不見得已收錄了所有現存的韓國詩話的全部。有些傳世詩話，趙教授雖知其名，却始終無法讀到，更別說搜求到了，譬如丁若鏞《籟翁閒談》就是。有些傳世詩話，趙教授是搜求到了，可是由於某些我們不知道的原因，未見編入《叢編》之中，譬如鄭萬朝的《榕燈詩話》就是。（三）這等於說還有若干韓國詩話我們未嘗寓目，不敢說其中所載必無可取。倘使有可取之處，那麼我們的輯錄，便算有所遺缺了。其次，在《叢編》中篇幅最大的《龜欄詩話》，受到時間和人力等的因素限制，我們打算另行全部整理，書中資料暫不選錄。另外，《叢編》採錄的資料，以成書或成卷者為主，韓人文集中單篇或零散的論詩文字沒有包括在內。這些文字，為數一定不少。從廣義的角度看，這些文字也算是「詩話」，起碼算是論詩資料；可是我們仍未寓目。

我們的研究題目為《韓國歷代詩話中論述中國詩歌有關資料的輯錄和整理》。用上「詩話」之名，那是為了配合趙教授的《叢編》而定的。實際說來，何謂「詩話」，其範疇如何，中韓日三國古今學者的

說法不盡相同，當世三國學者對這問題的討論尤為熱烈。去年七月間，韓國忠南大學舉辦「東方詩話第一次國際學術發表大會」，不少學者在會上就詩話的概念、範疇和定義等相繼發言，但未達成一致的看法甚至是相近的看法。(三)趙教授在會上發表了《詩話的廣義性》一文，我們結合他過去和現在的論議，覺得他對「詩話」一詞，傾向廣義說法，主要包括兩點：

甲：就作品的形式說，可以是結構謹嚴的論著，也可以是隨筆的體裁。

乙：就作品的內容說，包括諸般詩的評論的總名曰詩話。諸般詩的評論指：詩談、詩議、詩評、詩論、詩話、詩說，乃至詩句、詩訓、詩則、詩範、詩規、詩史、詩格、詩解和句圖。(四)

而乙項又可以作這樣的分目排列：

話說類：詩話、詩說、詩議、詩談。

批評類：詩評、詩品、詩論、糾謬。

格法類：詩法、詩格、詩則、詩範、詩體、聲律。

注解類：批注、詩解、詩訓、詩序。

史傳類：詩史、小傳、詩所、本事詩。

句圖類：句圖、題目型、分類型、論詩絕句。(五)

《叢編》就是根據以上的觀念編成。

我們無意堅執某家某說。我們的目的只是輯錄和整理，把資料介紹過來。目的如此，則希望盡可能

包括各種各樣有價值的資料，只要多少和詩歌有關係，都不排拒。至於資料出於怎樣形式的作品才堪採錄，我們倒不過分重視。

我和陳永明、吳淑鈿兩位教授的三人小組開始工作不久，便得到詹杭倫先生加入。詹先生從四川師範大學來香港從事其他學術項目的研究，不過他同時十分樂意參與小組的工作。研究計劃最後算是有個成果，詹先生的幫忙起重大的作用。

## 二

以下說說我們工作進行的具體步驟。

步驟主要有四個：第一，分頭閱讀全本《叢編》，標出準備選錄的章節段落。第二，影印選出來的章節段落，分別句讀，加上新式標點。與此同時，對文稿進行必要的整理工作。第三，資料重加篩選，打印編纂。第四，編製索引。

第一步驟主要是閱讀。工作開始前，我們定下三點準則：其一，初階段選文，不妨求寬求全，暫時不衡量其學術上的意義或價值，只要主題圍著中國詩歌，都打下標誌。其二，段落內容如果以韓國為主，只是旁引中國作者或作品輔助說明，原則上在捨棄之列。其三，一些段落明顯全部抄自中國作品，沒有重要增刪，可以考慮擱置不錄。譬如以下例子：

甲、余於陶謝之後，劇喜鮑明遠。蓋宋齊以來，駸駸趨於靡麗，多姿而少骨，西京建安之音節，



幾乎絕矣。而明遠之詩，乃獨俊快矯健，骨氣高強，類非後來諸人所可幾及；是以李杜亦極崇尚。朱夫子謂李太白專學之者，得之。太白天仙之才，雖出天授，而其奇逸之氣，固自有所從來矣。  
 (《叢編》第六卷：李宜顯《陶谷雜著》)

乙、鄭湖陰《四達亭》題詠曰：『朱明麗景燦庭心，簾額波光亂躍金。午枕慵來開睡睫，黃鸝飛下綠槐陰。』按春日謂之麗景，而今曰『朱明麗景』，則恐未安。且末句全用宋人『黃鸝飛下石榴陰』之句，豈景與意會，不嫌相犯而然耶？  
 (《叢編》第二卷：李晔光《芝峰類說·詩評》)

《讀放翁詩》條：『壽松堂上一梧支，境寂方憐來夢兒。開花富貴禽相賀，流水清閑鷺自知。酒氣發豪遺伐性，笳聲如訴更為悲。永日晴窗消遣法，有時讀罷放翁詩。』  
 (《叢編》第十五卷：趙漢復《藝叙詩話》)

丙、『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奇。』  
 (《叢編》第九卷：佚名《詩話類聚》)

甲條所論不出中國評論者的範圍，但畢竟是著者綜合衆說自己寫出來的文字，條理可觀，故加採錄標誌。乙條第一則指出韓人襲用宋人句子，主要談鄭湖陰(韓人鄭士龍)詩，對研究中國詩歌無甚幫助。第二則雖以讀陸游詩作題目，事實上作者只寫自己一時的環境，全無論議陸游詩的地方，所以兩則均不採錄。丙條中的引詩是柳宗元《漁翁》。此條原出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柳詩有奇趣》條，韓人

文字基本相同，惟末句《夜話》作『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稍異，畢竟分別小得很。碰到這種情況，儘可不下採錄標誌。

第二步驟主要是標點整理。這一階段該是工作最繁重的階段。首先，影印下來的章節很多。本階段初期，我們還未決定哪些章節該保留該放棄，為慎重計，全部標點，工作量自是不輕。其次，《叢編》的資料，大半只據手抄本影印，好些手抄本的字體不很端整，辨認頗費工夫。再則抄本中有相當數量的簡體字和俗字。這些字有些跟中國的相同或大同小異，一下子能看明白。但也有些純粹是韓人用字，中國似乎不用，問題於是出現。韓人用字又可細別為兩類，一類是：孤立看來，儘管辨認不出是甚麼字，不過聯繫文句上下，本字可以指出。譬如『劔』字，書中用來抄王士禛《闔廬墓》詩：『劔池春日水清虛。』又注云：『秦始皇欲發吳王墓，取寶劔鑿劔池』，則『劔』為『劍』字，立刻清楚。又譬如『焯』字，很難猜想原來是『耿』字，可是文句如果這樣寫：『有趙笛者，貧而焯介，家有蘇軾筆帖。時有道臺借玩，請以三百金易之，又動以富貴，俱不許。』聯繫到文字內容和與『焯』結合成詞的『介』，則『焯』之為『耿』，應該沒有問題。另一類是：即使推敲上下文理，還是辨認不出本字，譬如《叢編》第十四卷所錄金某氏《海東詩話》一段：

古人詩類皆窮苦，如孟郊、賈島，以寒瘦枯淡之詞為奇警。有上舍李吉祥，屢亂稱屈，嘗作詩曰：『班白豈非為老翁，飄飄日用尚孩童。驚人只有疏狂語，輔世曾無細小功。嗜酒過三杯止渴，題詩無一句全功。乾坤容汝德何序，汝自加修慎始終。』此正自家實錄。

文中「胤」字「序」字，很不好認。「序」也許是「厚」字，「胤」字却是難以揣測了。(八)

對文稿進行必要的整理工作，我們定出以下的原則：

甲、文章中的簡體字或俗字，能辨認出的或基本上能確定的，一律改爲流行正體。辨認不出，保留原字。電腦打字時倘使打不出來，盡可能手寫補上。書中筆畫不清晰而難於辨認的字，打字時留下空格「□」符號表示。

乙、韓人引詩句，當中文文字即使明知和中國流行的不同，一般暫時保留不改動，以待進一步考察有沒有校勘價值。好像《叢編》第一卷中李齊賢《櫟翁稗說》一段：

杜少陵有「地偏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之句。予曾游秦、蜀。蜀地東高西卑，江水出岷山，經成都南，東走三峽，波光山影，蕩搖上下。秦中千里，地平如掌，由長安城南以望，三面綠樹童童，其下野色接天，若浮在巨浸然。方知此句少陵為秦、蜀傳神，而妙處正在阿堵中也。

按「地偏」兩句，出《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九)檢《仇注》、《錢注》及《九家集注》以及其他宋人本子如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註編年杜陵詩史》和闕名《分門集註杜工部詩》等，兩句均作「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即使明代後期韓人李植(一五八四—一六一〇)《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也作「地平」「天闊」。李植並且特別就「平」「闊」二字作說明：「平處見江之動，闊處有樹之浮。」可見李植所據版本，文字與中國的相同。從版本的層面說，李齊賢似前無所據，取信不易。雖然這樣，我們還是暫時不作校改，原因是：關中平野廣延，杜甫《樂遊園歌》所謂「秦川對酒平如掌」。李齊賢謂「蜀地東高西

卑」，非盡平坦，然則用「平」字形容蜀地而非秦地是否絕對恰當，仍可考慮。此其一。就李齊賢文字看，所謂「千里」，所謂「接天」，極能扣緊「遠」字，可見李氏口中所誦句子確是「天遠樹浮秦」，「遠」不是後世誤抄所致。此其二。不過倘使我們確切知道是誤抄的話，我們會不憚改正的。好像《叢編》第十三卷中佚名《東詩叢話》引王士禛的《秦淮雜詩》當中一首：「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舟。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首二句均下「舟」字韻，絕無此理，其誤顯然；第二個「舟」字改回「樓」字。又好像《叢編》第十一卷中李鈺《百家詩話抄》引杜甫《示獠奴阿段》詩「曾聞陶侃胡奴」。句僅六字，顯有脫逸，便在「奴」下加回「異」字。相反，句中誤書重字，也代刪去，譬如《東詩叢話》中評王士禛曰：「竊謂阮亭胸胸次……」，顯然衍一「胸」字，刪除。

資料中張冠李戴的情況也會不時出現，譬如《叢編》第一卷中尹春年《體聲聲三字注解》，尹氏自撰《詩法源流序》云：「所謂聲者，即沈括所謂「宮羽相變，低昂殊（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者也。」「宮羽」數句出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人所共知。「沈括」云云，顯屬誤書。一般而言，詩句錯配作者的時候比較多。我們會盡一己所知作修改；不過一時難一一核正，想來遺漏未改正的一定很多。

第三步驟是再次篩選資料，一些過於熟套的章節刪掉了，一些抄襲中國作品程度比較大的章節刪掉了。抄襲的範圍同時還延伸到韓國作品去。韓國後代作家往往有抄錄本國先賢文字的做法，却又不注明文字的來歷出處。我們認為：選錄第一次出現的文字已經足夠，後出者不必採用。當然，後人抄錄前人文字，或增或刪，並加評議發揮，則這樣的文字需要保留，不在話下。譬如李晔光在《芝峰類

說·詩評》論孟浩然「江清月近人」和杜甫「江月去人只數尺」二句優劣的意見，近人李家源（一九一七年生）《玉溜山莊詩話》重錄一過，我們便擱下了。可是李家源記明使朱之蕃憶述見王世貞一段文字，內容有在洪萬宗《旬五志》之外者，我們便加採錄。

三

韓國詩話提供的資料，對研究中國詩歌有重大的價值，茲從以下幾方面作說明。應該指出的是：以下幾方面不等於全部的價值，那只是我們在輯錄整理過程中看到的犖犖大端。應該說，韓人資料是個蘊量極其豐富而品種極其多樣化的礦藏，即使努力採掘，也不是短期間內可以開採淨盡的。

一、論詩的價值

韓國歷代不少學者學養豐碩，詩學湛深，談論詩歌問題時，往往能提出獨特而可取的見解。這些見解或者中國學者從未提及，或者即使提及，也在韓人之後，可能又不如韓人的清晰完整。他們的獨特而可取的見解，對我們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參考作用。所謂「論詩」，不妨從廣義的角度看，可以是總說，可以是注解，可以是辯正，可以是論析，可以是評賞及其他種種。以下試從上述五項各舉例子說明。重復一遍，上述五項不等於論詩價值的全部。

總說之例：

申欽《晴窗軟談》（叢編）第二卷）云：

古人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清是詩之本色；若奇、若健，猶是第二義也。至於險也、怪也、沉著也、質實也，去詩道愈遠。清則高，高則不可以聲色求也。詩必得無聲之聲，無色之色，澗澗朗朗，澹澹澄澄，境與神會，神與筆應而發之，然後庶幾不作野狐外道。故歷觀往匠，閒居之作，勝於應卒；草野之音，優於館閣。蓋有意而為之者，不若得之於自然也。

申欽論詩，最重「清」和「自然」。「自然」是「有意為之者」的相反面。唐以後人論詩，有人仍舊重視自然，譬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論》說漢魏詩「不假悟」，最為上品。又譬如陸時雍認為杜甫五古比不上漢魏之作，純是「自然」與「有意」之別：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跡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詩鏡總論》，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本）

但也有有人——也許是大多數人——推重杜甫、韓愈的作意謀篇、造句遣詞，這便很難說強調「自然」了。說到詩的風貌本色，唐代以後，杜、韓的影響最大，評者儘管欣賞韋、孟一系之「清」，但更樂道杜、韓一系的雄渾雄奇。實際說來，以「清」為詩的本色，原是六朝人的主要觀點，鍾嶸《詩品》屢用「清」去推許作品。譬如他說古詩「清音獨遠」。又譬如他肯定鮑照詩有詼詭、靡曼、骨節、驅邁之長，但「頗傷清雅之調」，未免有缺。申欽論詩，事實上是相當全面地回復六朝人的觀點的。對或者不對，姑且不論；但

跟唐以後的中國論者，態度頗不相同。這便不能看成純粹無意義的復古，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以古爲新了。

注釋之例：

李晬光《芝峰類說·唐詩》（叢編）第二卷二云：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註：「青牛，花葉上青蟲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一〕余謂青牛蓋用老子事，以尊師隱居不出，故青牛閑卧也，註說誤矣。于鶴

《贈王尊師》詩「青牛眠樹影，白犬吠猿聲」，〔二〕亦此意。

「青牛」是細小的昆蟲還是巨大牲畜，後人解釋不同。清人王琦《李太白詩註》先引《列仙傳》「老子乘青牛車去，入大秦」，再引楊齊賢注；最後下按語：「青牛」白鶴，不過用道家事耳，不必別作創解。推王琦之意，不以楊齊賢注爲然。近人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三〕也不同意「青牛」爲「青蟲」說，強調「青牛」祇是用老子青牛事」。又引《神仙傳》：「封君達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以爲「切雍尊師說」。另外，還指出「花葉上青蟲太微細，與下句不甚稱，亦與隱居景象無涉」。結論是：「說雖新，不必從也。」然則王、瞿、朱三人都主張「牲畜說」了。近人只有郁賢皓的《李白選集》仍據楊注。

李晬光的主張屬中國王琦一路。當然應該指出：李晬光明末人，而王琦注本成於清乾隆年間，他是早在王琦之前提出來的。另外他說「尊師隱居不出，故青牛閑卧也」，把牛所以卧以及句子與題目中

『隱居』一詞的關係提出合理的說明。瞿、朱二氏批評了『青蟲』與隱居景象無涉，却也不曾進一步指出何以『牲畜說』便跟隱居有涉；李粹光正好在這一點上加以補足了。中國著名注家，以及目中所見近時各種李白詩注本，都不曾在這一點上像李粹光那樣清楚闡明。

辯正之例：

車天輅《五山說林》（叢編）第二卷論李白詩《枯魚過河泣》句云：

《枯魚過河泣》：『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誠。』柏人『當作』柏谷。《史記·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賈高等乃辟人柏人之置。』此高祖非微行人。潘岳《西征賦》：『長傲竇於柏谷，妻睹貌而獻餐。』注：『武帝微行，夜至柏谷，亭長欲殺之』云云。（一）

『柏人』，各本無作『柏谷』者。詩句是否本為『柏谷』，不得而知；但『柏谷』之義確較『柏人』為長，值得注意。因為白詩首二句云：『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蕭、王等注均引《說苑》卷九，提出白龍所以為豫且所制，因為他『下清泠之淵，化為魚』。這等於天子『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瞿、朱二氏注本詩後指出詩有譏諷玄宗微行之意。舊注引《史記·張耳傳》，但漢高祖過趙，趙臣賈高等雖埋伏甲士意欲加害；不過就高祖來說，他不是『棄萬乘之位』，所以車天輅說他『非微行人』；他也不見得不應過趙而過。總之他所作所為不一定不對，因而也不需因此而有所『誠』。後來他『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二）還可以說是『慎』之至。漢武帝到柏谷去的事則不然，潘岳《西征賦》說他『厭紫極之間敞，甘微行於游盤』。《文選》李善注引《漢武故事》，把



過程寫得很清楚：

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官。

漢武微行，只是厭倦了官中的生活，想到外間游耍一下而已，沒有甚麼迫切理由，其實是可以不去的。他以帝王之尊，輕率微行，險些出事，這倒是要引以為誠了。車天輅的辯論，實見合理，中國古今學者未見於此注意。

論析之例：

李晔光《芝峰類說·詩評》：

李白《鳳凰臺》（全題為《登金陵鳳凰臺》）詩，起結兩句全襲崔顥法。第二聯是尋常懷古語，且與五言詩「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sup>二五</sup>同意。第三聯視「晴川歷歷漢陽樹」，太不侔矣。且既曰「江自流」，而又曰「二水中分」，似疊。余妄謂李白此詩，雖不作可也。

這裏拿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和崔顥《黃鶴樓》詩作比對。李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崔顥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二詩高下和關係，古人有不